



杨佳在2015年全国政协大会发言

“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，29岁之前，我是在超越别人；29岁之后，是在超越自我。一个人可以看不见，但不能没有见地；可以没有视野，但不能没有眼界；可以看不见道路，但绝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。100次摔倒，可以101次站起来！”这是杨佳多次在演讲中说过的一段话。

成功人生遭遇断崖式下跌

29岁以前的杨佳，是很多人心目中成功学者的典范，一个聪颖的湘妹子。1978年，年仅15岁的她就考上大学，19岁留校当教师，24岁成为中科院大学最年轻的讲师，连年摘得中科院大学优秀教师的桂冠，一路走来，阳光灿烂。

29岁不幸失明，杨佳凭借惊人的毅力，不仅重返中科院大学讲台，而且还在失明8年之后考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，攻读公共管理硕士。

杨佳回忆说：记得《微观经济学》第一堂课，老师一上来就挂了两张图：“这是里根时期的经济……”“这是克林顿时期的经济”。大家看了一目了然，可对我来说却是一片茫然，只好课后加班。哈佛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。学生全凭记笔记，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，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，等身边的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，我就随着老师的讲课熟练地打起字来。一堂课下来，同学们说：“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”。

每分钟听英文单词400个是什么感觉？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，因为杨佳没时间，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量不下500页，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，对她来说，就更不够了。因为她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，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时间全没了，只能靠拼速度了。读不完的书、做不完的作业，还要参加许多多的学术活动。就这样，杨佳每天学习到夜里两三点，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，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，多学了3门课。杨佳的毕业论文《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》，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。戈根教授为她破例打了哈佛最高分“A+”。

毕业典礼上，院长约瑟夫·奈对杨佳说：“祝贺你！佳，你是中国的软实力！”顿时，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，为杨佳，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。2011年，杨佳又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2011年度唯一得主，同时也成为中国大陆获此殊荣的第一人，成为全世界获此奖励的第19人。

首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

哈佛的成功学业，只是杨佳人生的一个新起点，在这之后，她又走出了国门。

2008年10月，杨佳赴纽约竞选“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”委员。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，她活跃在会场内外，用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热情同各缔约国代表交流。最终投票时，她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，成为我国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。

2009年2月，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日内瓦召开。其中一项议程是建章立制、选举产生主席团。杨佳发现候选人中唯独没有亚洲代表。在听了几位委员自荐的发言后，杨佳举牌要求发言：“我们委



2011年杨佳荣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“校友成就奖”

员会是全球残疾人维权的监督机构，当今世界哪个洲残疾人最多？亚洲！哪个国家残疾人最多？中国！……”

杨佳的一席发言引起了强烈共鸣。她被提名为候选人，成功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，并在几年后连任。

第三次委员会会议，最后一项议题，秘书处突然提出，由于经费紧张，建议委员会工作语言中取消中文。杨佳强烈反对，据理力争，旗帜鲜明地捍卫我国的利益和地位，最终保留了中文，为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赢得了更多话语权。

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，杨佳在第一时间说服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发表声明，对中国切实有效保障震区残疾人的各项权利给予关注和支持，吸引了更多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声援。她的快速反应对于联合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，被推崇为“中国模式”。杨佳利用联合国这一平台，让世界把目光一次次投向中国。

首位作政协大会发言的盲人委员

3月11日下午，政协第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，这是一个特殊而光荣的时刻，十二届全国政协迎来了第一位在大会作发言的盲人委员——杨佳。

点赞正能量、厚爱正能量、弘扬正能量——杨佳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。

“过去的一年，或许一些社会不公让你寒心，或许一些人性的冷漠刺痛你心痛，或许一些网络‘吐槽’令你反感，或许一些生活中的‘负能量’使你沮丧，但总有一些人让你难忘，总有

作为一位中途失明的人，杨佳是不幸的，但是，她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：她是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；她是我国第一位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委员，随后当选和连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；她是第一个在全国两会期间作大会发言的盲人委员……她就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、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。

盲人杨佳

你是中国软实力

本报记者 叶晓楠

一些事让你热泪盈眶。”“那些发生在基层、发生在普通人身上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善举义举，绵绵不断地传递着别样的温情和满满的正能量”……“你怎样，中国便怎样……中国怎样，你才会怎样！”

杨佳发言时，赢得了全场最多的掌声。“杨佳的发言说到我们心里去了，她是用心在讲。”“她虽然看不见，但她的发言感动了所有人。”杨佳的压轴发言赢得了广泛赞誉。

杨佳告诉记者，直到今年春节前几天，她才接到将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的任务，而后就是不断修改和定稿的过程。“点赞正能量、厚爱正能量、弘扬正能量，这不仅是九三学社中央交给我的任务，也是我的心声。”杨佳说，“准备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、不断提炼的过程。”

到今年，杨佳连续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了。记者了解到，在这个平台上，她认真履职，积极建言：《怎样做到两个奥运同样精彩》等提案被有关方面采纳。她还就“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”、“维护残疾人权益”等问题在政协大会上呼吁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。在担任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，为北京奥运会、残奥会志愿者制定专业服务标准，填补了国内空白。近年来，杨佳还提出了“加强‘失独家庭’心理关爱与救助的建议”、“关于重视部队听力保护 增强我国硬实力的建议”等提案，以自身经历和独特视角，关注并提出涉及人身安全的相关问题等。

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，杨佳说：“感谢命运让我知难而进，自强不息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家门、走出国门、走进光明、走向世界！”



上图：杨佳在联合国
左图：失明前的杨佳



“刺绣皇后”姚建萍

揭秘国礼

背后的故事

王鹤瑾



江南小院，刺绣是一道别样的景致，孕育出一代又一代刺绣艺术家

姚建萍，国家级苏绣非遗传承人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授的“民间工艺美术大师”，全国“三八”红旗手。她的作品曾两次搭乘卫星“飞天”，被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、白金汉宫收藏，多次作为国礼赠送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，被誉为“刺绣皇后”。

2014年5月，姚建萍接到总书记访韩制《木槿花开》国礼的任务。姚建萍和她的团队从收集素材到创意设计，再经整理筛选，共准备了8套方案，

经来回讨论、修改，才得以确定最终方案。

《木槿花开》是一幅双面刺绣，要绣制6到8层，通过分层加色，尽现花弄光影效果。为了表现木槿花和背景的虚实关系，整件作品运用了12套色系，计116种颜色。绣面上三朵木槿花：一朵绽放、一朵待放、一枝含苞，体现青春活力。

然而，6月26日国礼送达北京验收时，姚建萍发现绣品外包的凸面玻璃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斑点，她立即决定将国礼带回苏州。次日，她从40多块凸面玻璃中选出这一块完全没有瑕疵的安装在，并于当晚乘坐火车直奔北京。

去年9月，姚建萍又接到一个新国礼制任务：为两个月后来参加APEC会议的墨西哥总统夫妇绣制一幅夫妻像，要求11月以前完成。

姚建萍知道，绣一幅单人肖像，一般需要6至8个月，现在要求双人像，时间只有两个月；更为难的是，要绣双人像，却没有一张双人像片，这几乎是一个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，但北京方面坚持邀请她出手。姚建萍最后一咬牙：接！

9月30日，姚建萍的团队一共拿出了3套设计方案。10月1日，姚建萍开始闭关创作。7天期间，她关掉手机，把自己反锁在工作室里，每天由工作人员送两次盒饭进屋。每天，她睁眼就在绷架前，有时一抬头已是深夜2时，或者早上6时。由于这次作品尺幅较大，身材娇小的姚建萍伸手够不着。她一咬牙，索性跪着绣。终于赶在11月10日将成品交付给了定制机关。

几个月后，姚建萍收到了墨西哥总统培尼亚的致谢信，这让姚建萍感到意外和惊喜。在她的印象中，一个国家元首亲自给国礼艺术家回信，是非常罕见的。

现在，姚建萍最担心的还是苏绣的传承。去年9月，“清华美院·姚建萍中国刺绣教学实践基地”顺利建成，姚建萍尝试利用高校平台，培养“能绣懂画”、“能画懂绣”的新一代复合型刺绣人才。“苏绣想要在当今社会焕发新的光彩，就必须不断创新，不能满足于旧的题材和手法。所有的技术技巧都是为内容服务的，而思维的创新则是苏绣发展的第一要义。”姚建萍说。



国礼成品



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无疑会凝聚成引发观众们热议深思的文化符号，它们更为形象生动地传递电影的灵魂，进而渗透大众的骨髓并形成一种广为关注的文化现象。也许这才应该是拍电影所追求的一种状态：我们放映电影，谈论电影，想当导演的年轻人老老实实地坐在影院里一部一部看片，研究怎么拍电影，而不仅仅是追求速成、追求社交、指望一朝登天的运气。

——剧作家焦雄屏指出。

如今，文艺创作纯粹以“逗乐”为目的，“乐”必然流于浅薄、低俗。大众审美接受并热衷于这样的所谓“幽默”，反映了大众审美选择上的盲目。文艺作品有其自身的创作原则：作品的思想、精神内涵要求“雅”，给受众以高尚情操、高尚审美的教育。文艺创作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，倡导和弘扬生活中积极、健康、高雅、优良的东西，摒弃和鞭挞生活中丑恶、虚假、低级、拙劣的东西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在服务大众的同时，引导和提高国民的人文修养，这正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——书法家徐利明表示。

文学是作品的魂和根，不仅在戏剧、电影上如此，在其他领域也适用。文学本身是人学，最重要的是要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。好剧本缺失，正是创作者对人的命运缺乏深刻的认识。对于如今的网络文学，我认为，这是一个新兴的形式，应该看到并且顺应这个变化。有网络作家给人艺写剧本是一个好趋势，因为他们有鲜活的生活，有接地气的表达，这些非常可贵。人艺必须重视这些创作和它们所带来的文化观念上的变化。

—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说。

保护古村落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“根性文化”。对古村落的保护，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，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，还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，如设立生态博物馆、民族文化生态村等对文化遗产进行“就地保护”，这样有助于文化在其植根的“土壤”里“生长”“发芽”“开花”“结果”。

——学者蔡照认为。

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，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坛占据应有的位置，已经是一个难以回避、既严肃又紧迫的话题。为此，向外看，向域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是必要的；同样，向内看，学习自己的优秀传统也是十分必要的。这就要梳理中国叙事经验。这种经验一部分是中国当下的叙事经验，再一部分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。在创作实践中，我们要将这二者紧密相连。

——作家王彬指出。

文化生态系统很大的一个层面是以村落为基础的。因为有了村庄聚落，才有了民俗活动、民间劳作等丰富多彩的生产和生活。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文化发展参差多态，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性和多样性。一段时期以来，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这样的文化格局，在更深层次上还有文化的同质化，以及发展特色的缺失。就像不少农民工群体没能融入城市生活又离乡背上，若是斩断了乡愁，文化上就处于一种踟蹰飘零状态。所以，我们应该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关注农村，关注我们的乡土文化之根。

——全国政协委员潘鲁生表示。

如何解说古典音乐，一直以来都是欣赏古典音乐的难题。许多人或许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坐在音乐厅里听古典音乐会，大部分时间却不清楚台上到底都发生了什么，要靠匆匆扫一眼节目册才能推断出现在演奏章节和曲目，谈论此刻音乐的调性、主体、结构、意义。而古典音乐毕竟不像一场体育比赛，它更加精密复杂，也容不得解说的打断和喧哗。但如今，就在“古典音乐注定是一种小众艺术”成为一种基本共识时，这个艺术门类的门槛却被新技术撬动了，一改之前自身使浑身解数却吸引新受众不得的局面。

——播音艺术家石鸣认为。

（曹馨月辑）